

“儒林”之旅的回顾与反思

陈美林

【摘要】 自述半个世纪来研究《儒林外史》的历程,从考索吴敬梓的家世、探析其思想面貌,为其立传起始;进而又从多方面评论其作品《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并采用“五四”以来少有人运用的批点形式,前后进行四次批评,均能公开出版;尔后又研究前人的研究,撰写了《儒林外史》研究史。在研讨过程中联系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一己之见,可作为研究史当代一页的补充。在回顾研究历程时,也述及个人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如文与史的关系,认为二者可以互证,但不能互代,并且在校、注、评等方面均举例说明。

【关键词】 《儒林外史》;吴敬梓家世;《儒林外史》研究史

2018年金秋十月,商务印书馆文史室主任陈洁同志来电,告知拙作《陈批〈儒林外史〉》(套红本,下称“陈批”)近将重印。该书于2014年8月第一次印行,此次重印,乃将书后所附笔者的著作目录补充至2018年,计有著作47种、论文341篇,涉及古代文史多方面;但吴敬梓和《儒林外史》课题所占比重最大,书20种,文161篇。有友人、弟子得知,一再建言,“陈批”已是第四次批本,又将重印,可见受到读者欢迎,不妨谈些体会,既可为一己小结,也可供他人参考。其实,这一要求既往亦有。如2006年春,王廷信教授从北京开会归来,找到笔者说《文艺研究》每期刊发一篇对学界名人的访谈,编辑部同志在会场寻找认识笔者的人,廷信应声而出,编辑部乃委托他采访在下。廷信说,他早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5月7日)读过《陈美林和〈儒林外史〉研究》的“专访”,至今已十余年,其间又出版了许多成果,应可再次谈谈感想体会。为此,不便拒绝,乃应命接受访谈。廷信先说及“先生研究领域涉及面极广,在戏曲、诗文、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方面都有论著,但使您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则是有关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成果。”因而这篇题为《萋兮斐兮,成此贝锦》的长篇访谈,乃以谈此专题为主,发表在该刊2006年10期,后又被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78号(2009年12月)全文转载。又经十年,《凤凰江苏》名记韦晓东于2016年10月27日前来采访,在“金陵学人访谈”栏目发出专访文章。次年,《博览群书》(2017年第10期)又发表了《〈儒林外史〉研究的陈美林现象——文学经典与“创造性阐释”的述评》。如今“陈批”重印,又有同志提出同样要求,自然也不能坚拒。

笔者研究这一课题始于1971年。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担任元明清文学教学时也曾讲授过《儒林外史》,但其时的研究偏重于古代戏曲方面。那时做出的一些成果,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方始由中华书局印出,外文出版社还将带有创作性质的古代名剧改写本出版了英、法、德文本。

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这在《戏曲教学、创作与研究——陈美林教授访谈录》^①一文中有所报道，此不赘述。而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虽迟于戏曲、诗文，但2003年退休以后仍在继续，就这一课题而言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确有必要做些检讨，乃不揣谫陋，做些不足为训的回顾与反思。



回顾近半个世纪研究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历程，大体上是先行考索作家的家世生平，探讨其思想面貌；然后再据此对其创作进行深入论析；最后则是对历来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当然，这三段并非截然划开，而是交错进行，只是每一阶段有所侧重而已。此文不拟一一介绍自己的论著，而是就每个阶段的思考、探索略作回顾，偶或引述有关讨论和评述。

清人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②鲁迅亦有言：“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③这都表明要研究作品，必先研究作者，要了解其家世、生平、交游、际遇、思想以及生活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学术思潮乃至社会习俗等等，然后方能切合实际地论述其著作产生的背景、文学价值、社会意义和历史地位。

笔者最早研读的著作，除吴敬梓所作《儒林外史》和《文木山房集》以外，就是胡适、鲁迅等人的有关论述。《文木山房集》中有一篇《移家赋》，从赋中知道吴氏一族“五十年中，家门鼎盛”，但“君子之泽，斩于五世”，于是“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家族情况如此，而乡人邻里又如何呢？“似以冰而致蝇，若以狸而致鼠”，总是格格不入。于是“见机而作，逝将去汝”，举家迁往金陵，“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从此成为南京人。对家族如此状况，笔者反复考索，乃是由遗产之争而引起，又由于吴敬梓的特殊身份便处在矛盾的中心。吴敬梓为吴国对这一支中长房长孙，即所谓“宗子”，在祭祀活动中有主祭权，在遗产分配中可多得一份，因而常为同一支中的族人嫉恨，特别是吴敬梓这一“宗子”身份又是由出嗣而获得，更招致族人的不满。吴国对有三子：旦、勛、昇。长子吴旦只有独子霖起，而霖起无子嗣，旦乃从其弟吴勛第三子雯延众子女中择吴敬梓给霖起为嗣子。因此吴敬梓这一“宗子”身份倍遭嫉妬。胡适当年只从《移家赋》的夹注中找到其父为“赣榆教谕”的叙说，便在民国《全椒志》里“寻出”一个“做过江苏赣榆县的教谕”吴霖起，简单地断言其父为吴霖起，而于其过继一节则未曾虑及。后来者便一直沿袭“胡”说。笔者从有关诗文中发现记载吴敬梓之父死亡年月有两个不同记载，便以此为切入点，广寻资料，深入探析，得知其生父为雯延，霖起只是其嗣父。正因为此，在其生父、嗣父故去后，遗产之争便爆发，《移家赋》中所云“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即指此，虽然他丧失了大部分遗产，但终于认识到“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移家赋》）的诗礼传家的真面目，这对于他的思想转进和《儒林外史》的创作倒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于这一身世的考辨而撰写的《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于1977年第3期《南京师院学报》发表。其实，这篇文章是笔者数年考索的结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刊出。当年学术刊物不多，一年四期的南师学报，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很感谢主编冯世昌同志的支持，在1977年4期中有3期发了我的论文，除此而外，尚有《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④，这两篇都是研究吴敬梓的论文；其余一篇是《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释之争的关系》^⑤，20世纪80年代我校历史系一位老师参加唐史讨论会，在会上听到对此文颇有好评，返校后特地请人介绍至舍间索要此文。20世纪90年代，此文曾被韩

①陈美林：《戏曲教学、创作与研究——陈美林教授访谈录》，《艺术学》第四卷第三辑，2009年；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79号2010年3月全文转载。

②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载《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

④陈美林：《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⑤陈美林：《武则天以周代唐与儒道释之争的关系》，《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1期。

国《东方汉文学》(1996.12)全文转载,这且不去说它。《三考》一文首先为徐复先生见到,而“治经”文章则为段熙仲先生最早读到,均得到他们的好评。徐老受人之托曾向我借阅有关文章(包括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而此人逾期未归还。徐老为此于1980年8月10日写了一纸证明,开首即云:“我系陈美林老师精研《儒林外史》,蜚声学坛,其《吴敬梓身世三考》尤脍炙人口”^①云云。十年文革,文风以大批判为主,鲜有考证文字能见诸报刊。一位文革前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此际下放在扬州师院图书馆工作,见到此文后便对周围老师说:“十几年未见到这样的学术文章了。”上海戏剧学院陈汝衡先生正在修改己作《吴敬梓传》,见到拙作后便通过我系资料室主任赵国璋先生索要此文,后又不断直接向我索要新作。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先生从王西彦老师处见到此文,便由该社于1977年8月1日发来“沪版古字252号”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读者对象为大学文科师生。此书于1984年8月由上海人民社分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除《三考》外,尚有《吴敬梓家世杂考》《关于吴敬梓应征辟问题》《南京先贤祠的兴废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陈毅及其〈所知集〉中所涉及的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等等考索其家世、生平的文章,得到广泛认同。首先江苏省前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同志应安徽省之邀,参加了1981年在滁州召开的纪念吴敬梓诞辰2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开幕式上致辞中便说及“他的嗣父吴霖起在江苏赣榆县做官,他曾随同他父亲到赣榆”。^②此后,汪海粟又在1984年于南京举行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再次如此叙说。^③安徽当地的新闻媒体也如此报道,如《滁州报》(1981年10月13日)文中说“吴敬梓的生父叫吴雯延,继父叫吴霖起”;《安徽文化报》(1981年10月12日)介绍文章中说“吴旦的独生子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养父,吴勛的儿子吴雯延是吴敬梓的生父。”可见安徽省、地媒体均采用拙说。而参加280周年诞辰学术会的正式代表、吴敬梓的后人吴焯荣也亲自感谢笔者为他弄清家史。数年后病逝,全椒有关部门给我发来讣告,我则回了唁电。吴坪也曾在1986年7月10日有信给我,表示“我对远祖吴敬梓及其著作学习甚少,知者甚微。不久,方在这方面开始注意,因而颇感愧甚,很多地方,敬祈指教。对您在这方面所付辛劳深表感谢和敬意。”其实,吴焯荣生前一直不承认吴坪为吴敬梓后人,在1981年滁州会上和1984年南京会上,均未见有吴坪参加。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电视台拍摄《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专题片去全椒采访时,吴坪闯进吴焯荣家要求上镜头,被吴焯荣赶走。可是一旦吴焯荣病逝后,他即以吴敬梓后裔身份参加了滁州地区于2001年召开的吴敬梓诞辰300周年纪念会,并散发他于2000年8月“编纂”、自行印刷的《吴敬梓家世概述》,一反既往所承认的史实。但随后亦有吴氏族人发表公开讲话,如全椒退休教师吴其华先生曾来南京寻祖坟,并对《南京晨报》记者说:吴敬梓有四个儿子,他是吴敬梓长子吴焯的后人。吴敬梓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自幼便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④笔者与吴其华先生未曾谋面,也从无联系,仅从报端见其发言。至于学术界同道则大都赞同拙说,1984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近年〈儒林外史〉研究综述》一文,其中述及“吴敬梓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文中说胡适的“吴霖起说”,“被沿袭了五十多年,有同志对此作详尽的考证,证明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其生父是吴雯延,这个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这篇文章为正在承办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会议的南京师大的校刊特刊第79期(1984年11月1日)全文转载。《清代文学研究》一书中也评述说“发掘吴敬梓生平资料并及时做出考辨,这方面成就超卓者当推陈美林。还在1981年滁州会议之前,陈氏……便撰写、发表了近20篇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披露了一些前人所未曾见的资料,而且从多角度研讨了作家和作品,对许多学界陈说均有颇为翔实的考述”,并举吴敬梓父亲问题为例,说经陈氏考证,证明“吴敬梓的父亲是吴雯延”,吴霖起“是他的嗣父”,“这一结论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如陈汝衡《吴敬梓传》、孟醒仁《吴敬梓年谱》等,均对陈

①陈美林:《追忆今古文经学者段、徐二老》,《钟山风雨》2018年4期。

②汪海粟发言见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委员会编《吴敬梓研究》特刊,1982年。

③汪海粟:“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致辞,《南京师大》校刊第80期。

④《吴敬梓后人欲来南京寻祖坟》,《南京晨报》2005年6月9日。

美林的看法表示支持。”^①

尽管如此，我校整理小组两次所执笔的前言（刊于1977年和1981年书前），均坚持“胡”说，笔者并不去理会，因为他们如何撰写与笔者的研究是两回事，各走各的路，只是让“旁观者”感到惊讶而已。之所以如此，李灵年同志在《〈儒林外史〉新校注本工作追记》^②（下称“追记”）文中道出缘故，说“对学界的最新成就，例如吴敬梓的生父问题，未能坦然汲取，不免有‘妒道真’之嫌，”并自注引自《汉书·刘歆传》颜师古注：“妒道艺之真也”，也就是对真理的嫉妒使然。

参加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大都赞同拙说，唯有刘世德同志不以为然，特别见到我校领导执笔的“前言”中仍坚持“胡”说，更积极活动，还找了两位何先生推销他的高见，因为两位何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关于《儒林外史》的专著出版。在会议结束何满子先生返沪后于11月25日来信说，关于“嗣子嫡子一事”，刘世德同志曾向“向弟论及，言之似凿凿，但未见所据文字，只得姑且存疑。”何泽翰先生在会议间隙即向我谈及，对刘之所言不以为然。返湘以后，于1984年12月寄赠一首七律，云：

阳狂玩世秦淮客，薄俗纷纷过眼新。
著述九流甘末等，风标百代慕高人。
徽音愧我才难企，遗躅欣君地与邻。
更有金陵图咏在，赓歌好作盛时民。

美林先生于吴文木《外史》最为专精，赋赠即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弟何泽翰

何先生墨宝已刊于1990年出版之拙作《吴敬梓评传》之首。我校教授、著名词学家唐圭璋为南京籍学者，前曾在南京通志馆工作过，对乡邦文献非常熟悉、重视，当他听说刘世德同志说《金陵诗征》《金陵通传》的作者朱绪曾、陈作霖“所知不多”，颇不以为然。为祝贺此次盛会，唐老特作《减字木兰花》一词刊于校刊特刊。会后，唐老将其写成条幅以赠表示对我的支持，词云：

减字木兰花

奇才沦落。坐对钟山心自乐。拔墨研朱，描绘人间丑恶图。
飘香盈袂，千里有朋来相会。邃密同商，祖国文明更发扬。

纪念吴敬梓诞辰

美林同志教正

唐圭璋 一九八五年三月

原件影印刊于拙作《仿佛音容，如在昨日——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20周年》^③一文中。不久，刘世德同志终于发表了《吴敬梓的父亲是谁》^④。即便在此文中，刘世德也不得不承认拙说“为学术界多数人接受，在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中几乎成为趋向一致的固定的说法”。但他独持异见，举出所谓的“证明”七条以表述一己观点，但仔细研究，没有一条可以成立，便在《吴敬梓的父亲究竟是谁》^⑤一文中，逐条予以驳答。此后，何满子先生在为1988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儒林外史”条撰写说明时依然采取拙说。石昌渝同志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吴敬梓”条中也采用拙说。当拙作《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后，何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伟大也要有人懂》的书评，再次明确肯定拙说。长期沉默的刘世德同志突然发声，于2007年5月27日演讲《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①季羨林、张燕瑾、吕薇芬：《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634-635页。

②李灵年：《〈儒林外史〉新校注本工作追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③陈美林：《仿佛音容，如在昨日——纪念唐圭璋先生逝世20周年》，《世纪风采》2011年第11期；又收入《学林忆往》，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④刘世德：《吴敬梓的父亲是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

⑤陈美林：《吴敬梓的父亲究竟是谁》，《明清小说研究》1987年第6辑。

基本观点与1985年文一致,而错误更多、更荒谬。如在《金陵通传》中他居然发现《吴敬梓传》(其实,只有其子吴焘小传);又如将吴敬梓祖父吴旦的《月潭集》与其曾祖吴国对的《赐书楼集》相互调换;更荒谬的是将“孟冬晦前夕”之“晦”释为月半,“晦前夕”解释为“十五的前一天”。将农历每月最后一天,释为月半,进而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下结论,真令人感受到他的知识面竟达到何种程度。更恶劣的是在学术上驳不倒对方,居然欲从政治上来说事,这种“文革”遗风不能容忍,乃于2010年2期发表《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①一文,从学理上对收入2008年1月线装书局公开出版的《刘世德学术演讲录——大学者刘世德解析明清小说》一书中的原文予以解剖。拙作旋即被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81号(2010年9月)全文转载,直至今日未见其再有任何答复。友人论及此事,认为拙论所举各例均是“硬伤”,又何以解释!学术讨论应该相互尊重,不应从所谓的政治上做影射之辞!而严谨的学者不会理会这些非学术性的信口开河,自会择善而从,2016年12月18日陈文新教授在《儒林外史·前言》中依然采用拙说,“生父吴雯廷”“嗣父吴霖起”。^②

二

在考索吴敬梓家世、生平的同时,也对吴敬梓的思想面貌进行探索。而最早发表的论文则是《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其实此文已酝酿两三年,当工农兵学员撰写的《前言》中已有肯定《儒林外史》是“比较鲜明的反儒倾向”小说的评价,颇不以为然,这在笔者执笔的第一稿《前言》中是没有此种议论的。但当时(1974年5月)正是批孔反儒之风甚嚣尘上之际,岂能多言。而且在有些人看来,工农兵学员撰写的第二稿《前言》对《儒林外史》的反儒倾向似肯定不足,便由教师组成的新的前言小组,于“一九七六年六月”撰写了第三稿《前言》^③,肯定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对我们今天反修、防修,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肃清其流毒的现实斗争,是有借鉴作用的”,并且指出吴敬梓是“用经学新解等曲折、隐蔽的方式进行反理学斗争”的。同时,安徽人民出版社也不甘落后,几乎同时(1977年1月)推出安徽大学、滁州地区、全椒县三结合小组撰写的《儒林群丑的讽刺画卷——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书中说:“我们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的政治历史小说”,读读它“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普及、深化、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可以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此作曾在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于1976年6月以安徽大学学报增刊的形式发表。李汉秋同志先后将两种寄赠,题请“美林同志教正”。面对同事、同道如此议论,是默然不语以示同意呢还是表示不同见解,一时颇为踌躇。而《南京师院学报》在1977年第三期发表了三篇有关吴敬梓的文章,一篇即拙作《吴敬梓身世三考》,不涉及尊儒、反儒的问题。另两篇论文则针锋相对,一篇是外单位作者自投稿《〈儒林外史〉“反儒说”质疑》,针对《前言》第三稿中所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反孔批儒”的小说,表示了不同意见;一篇则是新的“前言”小组执笔人所写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讽刺小说——学习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论述》,在引述鲁迅的一些言论后加以自己的理解,断言“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反儒倾向的小说,结合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实际情况来看,鲁迅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此期学报一出,一些同事、同道便建议笔者就“尊儒”“反儒”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斟酌再三,以其“前言”中所言用经学反理学的命题入手,撰写了《略论吴敬梓“治经”问题》一文,学报乃于第四期刊出。在文中,笔者略述经学的发展,涉及今古文之争、理学与心学的分歧,以至清初顾、黄、王的见解,再联系吴敬梓友朋如沈大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的论说,以之比照当时可以见及的吴敬梓说“诗”的见解进行分析,

^①陈美林:《吴敬梓生平文献资料的引用、解读和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又收入《独断与考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②陈文新:《儒林外史·前言》,《儒林外史》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怀化,2017年7月,第9页。

^③本《前言》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儒林外史》卷首。

认为吴敬梓说“诗”，既采汉、也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不摒弃，“无论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在论‘诗’时有些不同于朱熹的地方，并不等于具有反对理学的进步意义”。同时，也详细地研讨了吴敬梓对“书”的见解，认为也不具有反儒倾向。

文章刊出后，首先受到校内段熙仲、徐复两位老辈学者的赞扬。因为从1950秋季起，高校所有经学课程停开，几近30年没有教师开设，学生自然茫然。所以段老一再称道，并推断作者何以能写出此类文字，说笔者是浙大毕业的，任铭善的弟子。马叙伦赞扬任先生为“经学江南第一”，段老对任先生也十分钦敬，所以方有此语。我乃如实告知，笔者于1950年秋入学，任先生已停开经学课程改教语言学课程，此乃课余闲谈时，任师提醒我们不可忽视传统学术。几乎与拙作刊发的同时，《开封师院学报》第6期也发表了任访秋先生的《反儒欤？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也不赞成“反儒说”。以此，彼此有了交流。任先生于1978年3月2日信中说：“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我过去没有很好考虑。大作读后，觉用力勤劬，颇多发明，个人深受启发。”当时一些同道也纷纷向笔者索要此文。1999年复旦大学周兴陆同志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诗说》，消息公布后，当年曾向我索取文章的同道纷纷作文，似乎他们早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复旦学报的张兵同志知道我早年写过此文，约我撰稿，我以已写过，暂无新见辞谢。倒是周兴陆同志后来出版的《吴敬梓〈诗说〉研究》^①的自序中提及拙作，说：“陈美林先生鸿文《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中曾就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给予详细的考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周兴陆同志是从拙作《吴敬梓研究》书中读到此文的，该书在1984年8月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论“治经”一文，早在1977年即发表于学报，也可以说，拙作倒是“五四”以后论及吴敬梓“治经”问题的第一篇文字。

为了进一步阐明吴敬梓的思想基本上未曾超越儒家范畴，先后又发表了《南京先贤祠的兴废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②《吴敬梓和释道异端》^③，从正、反两面进行探讨论证。

但笔者并未局限于仅仅从“儒家”一端研析吴敬梓的思想面貌及其发展变化，而是随着他的生活环境、时代、地域、交往、学养的变动，从多角度地探索其思想内涵，并以之去研讨被认为是“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的丰富内容。如发表了《略论吴敬梓应征辟问题》^④，以说明渠是否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又如《颜、李学说对吴敬梓思想的影响》^⑤《吴敬梓和戏剧艺术》^⑥《吴敬梓和科学技术》^⑦等等。有些视角，还反复探求，如他的学养“六代情”，1981年8月9日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发表《“秦淮水亭”史地考索》一文，就吴敬梓南京居所附近六朝文人故居和遗迹有所探考，以说明吴敬梓之“六代情”渊源。又在同年9月发表了《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⑧。稍后，李汉秋同志于10月在《江淮论坛》5期发表了《吴敬梓和竹林名士》。但笔者仍不断从这一视角继续探讨。直到2003年仍在第4期《文学遗产》发表《隆礼与崇孝——四论魏晋风尚对吴敬梓的影响》。总之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的提高，不断有新作发表。直到新世纪，仍在回顾对其思想面貌的探索，在《长江学术》第三辑发表了《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纪略——吴敬梓思想构成研究之回顾》^⑨。但从不简单为其贴标签，诸如儒家、儒道互补、道墨相浸等等。对他的思想局限，也进行具体分析，曾发表《吴敬梓的门阀意识》^⑩，着重讨论在移家之前和移家之初其思想面貌中的落后一面，不为之掩饰。当然，也指出其后的

①周兴陆：《吴敬梓〈诗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陈美林：《南京先贤祠的兴废及其与吴敬梓的关系》，《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③陈美林：《吴敬梓和释道异端》，《文史哲》1981年第5期。

④陈美林：《略论吴敬梓应征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⑤陈美林：《颜、李学说对吴敬梓思想的影响》，《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⑥陈美林：《吴敬梓和戏剧艺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⑦陈美林：《吴敬梓和科学技术》，《教学与进修》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

⑧陈美林：《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江海学刊》1981年5期，曾一度改名《群众论丛》。

⑨陈美林：《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纪略——吴敬梓思想构成研究之回顾》，《长江学术》2002年11月。

⑩陈美林：《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4期。

逐渐淡化,在新的环境中滋生出的平民意识。

无论是考索生平还是分析思想,均是为研究其作品服务的。1984年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笔者提交的论文即为《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为《文学遗产》编辑索去,刊于1985年第1期。20年后的2004年,仍在《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试论吴敬梓的生活环境与〈儒林外史〉的地域特色》。这一类论文历年尚有,不一一例举。

正因为匡亚明同志读到笔者的一些论著,便将他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之《吴敬梓评传》的写作任务交给笔者。为了希望笔者早日交稿,1990年,匡老还为笔者写了横幅,请其秘书送来:

美林先生 雅正

萋兮斐兮 成此贝锦

谨录《诗经·小雅·巷伯》篇句,预祝《吴敬梓评传》以传世之作早日面世。

一九九〇年二月

匡亚明时年八十又四

在匡老的督促下,《吴敬梓评传》终于作为第一批出版的四种评传之一,于1990年12月见书。匡老决定,将《吴敬梓评传》与其《孔子评传》等四部作为1991年召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赠书。这次会议与会者近七十人,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周谷城、赵朴初、苏步青、李慎之、任继愈、张岱年等与会,笔者也被作为正式代表邀请与会。由于拙作作为会议赠书之一,因而也引起与会者的注目,产生一定影响。1994年江苏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一等奖;又于次年(1995)在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比中,获得二等奖(排序第一),并应邀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由李岚清副总理颁奖的大会。匡老闻知,特别高兴,让《信息动态》76期发布消息《〈吴敬梓评传〉再次获奖》,说“据悉,举行这种大规模的评奖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吴敬梓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而名列其中,这对于扩大整套《丛书》的影响、提高《丛书》的声誉,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思想家中心”有关同志告知,从1990年12月出版以来,到2011年已印刷五次,并送来印数稿酬,香港公开大学馆藏图书还制成“光盘版”。

匡亚明同志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为推介“丛书”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在1996年5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丛书”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谷牧、孙家正、柳斌、滕藤等出席。著名学者有邓广铭、张岱年、周一良、任继愈等与会,笔者作为作者代表被邀与会,还有新闻媒体三十余家参加,计八十余人。李铁映作了书面发言,吴阶平、钱伟长、匡亚明等都发表了讲话。当晚“新闻联播”作了报道,并映出《孔子评传》《吴敬梓评传》等四部书的封面。这一活动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中央台和许多地方台都做了报道。

大约十余天后,中央广播电视台陈泽人、苏德福两位同志于5月28日到宁,找到笔者,说为了发展国际文化交流,中央台国际频道正在组织播映“中华文明之光”大型节目,计有150集,从炎帝、黄帝一直拍到孙中山。李岚清十分支持,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者撰稿,有季羨林、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侯仁之等,每集还采访有关研究专家,第133集为《儒林外史》,“学术界对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推崇,经研究拟在6月下旬前来采访”。果然,6月19日至21日,他们携带了摄影器材,向我校借用一部面包车使用。我还找了两位研究生陪同接受采访。在电视片放映时,看到片头下方有“南京师范大学协助拍摄”字样。如此就再次将吴敬梓及其杰作《儒林外史》推向国际,这也正是匡亚明先生的宿愿。在北京召开过新闻发布会后,匡老一直筹备在香港举行一次,但出齐一百部后,匡老已逝世,不过其遗愿也得到实施。1999年5月24日至29日,终于在香港会议展览广场办公大楼45楼钟山展览厅举办。与会者有教育部部长助理陈文博、南大校长蒋树声、香港大学副校长张佑启以及著名学者饶宗颐等。次日,港大校长还邀请部分学者参加在港大明华楼举行

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论坛”，有八位学者被邀请依次发言，即饶宗颐、陈美林、吴宏一、王水照、李家树、赵令杨、傅璇琮、蒋广学。笔者发言后，未及参加午宴，便取道上海转赴首尔。韩国启明大学为建校45周年，举办20世纪人文科学展望著名学者讲演大会，邀请大陆及台湾两地学者四人发表演讲。会后，首尔大学与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又举办一场讲演会，邀请笔者做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概况的报告。与会者有首尔地区一些高校担任中国文学课程的老师。会后有晚餐会，自由交流。

三

无论是考索家世生平，还是探析思想面貌，而后写成评传，但目的仍在于研究作品。何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发表对拙作的书评《伟大也要有人懂》一文中，说及笔者的研究历程有云，在《吴敬梓研究》于1984年出版后，便“转入作品研究，主要作品有《新批〈儒林外史〉》和《〈儒林外史〉人物论》。”的确，20世纪80年代前，笔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作家研究上，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则主要研究作品。当然，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如《吴敬梓评传》就是在《新批〈儒林外史〉》（下称“新批”）大体完成之后方全力以赴的。

《儒林外史》这部传世之作，正如胡适所言“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传最不广”。^①鲁迅也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②。如何使这部“伟大”的作品能让人读懂呢？当时流行的“赏析”类文字以及大块理论文章，均不能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笔者曾对清代的几家批点本即卧闲草堂本、齐省堂本、天目山樵本和黄小田本反复研读，并写有礼记（后来陆续写成专文，先后发表），认为这一传统形式如果加以改造，或可一试。在得到出版社同志的支持下，便着力为之。

要做一部新的批点本，便得从头做起，即以目前可见及的最早刊本卧闲本为底本，认真阅读，并不能如同新的整理本仅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张慧剑先生校注本基础上进行的”（见写于1981年1月的《儒林外史》“前言”）。为从头做起，便从认真研读卧本开始，边读边校点，全以一己的理解去做；点校一遍后再去参阅多本，再回顾一己所做的工作，凡有不同者必再三斟酌、反复修改。其后，便考虑批、评、注等问题。旧时批评形式多样，如序、读法、述语、缘起、弁言、小引、发凡、回前评、回后评、夹批、眉批、旁批等等。为避免烦琐，便利读者，决定采用前言（相当于导读）、夹批、回评、注释四种形式。至于夹批、回评的内容，必须摒弃“头巾气”，尽量避免迂腐，运用新的美学理论也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不可有学究气。而批评的语言风格，则努力做到与原作一致，过俗的语言不入评语，让原作与批评浑然一体。“新批”于1989年12月出版后，1990年6月4日和13日香港《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即有书评发表。《大公报》在《评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一文中，肯定“新批”的夹批回评“采用了我国传统文论的合理内涵，也借鉴了西方文论的诸多精华，因而整个评点点出了新见解，造成了出人意外、耐人寻味的客观效果，进一步引发了读者深入思考的兴趣。”该文作者还注意到“新批”的标点，“不仅分出句逗，而且考虑到文学作品的特性，充分发挥不同标点符号在文学描写方面的辅助功能”，并举例说明，如“第九回第十一自然段，‘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一句，各本均作作者叙述语言，陈本则点为船家所言，此方与下文四公子所说‘船家，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又请出与他看……云云相吻合’。”文章还认为陈批“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正说明笔者在做“新批”时全从一己理解去阅读、研究、评点，而不蹈袭他人。《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喜读〈新批儒林外史〉》首先说“新批”“是地地道道的评点”，是传统批评形式的新运用；其次认为批评的“笔墨凝炼，富有色彩”，“遣词用句，精扼准确，片言支语，观点鲜明，不故弄玄虚，又了无

^①胡适：《五十年以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28页。

枝蔓,理论见解往往渗透在富有感情意味的分析之中”,同时又“留有余地,启人思索”;最后认为“新批”“堪称《儒林外史》现存各家评点中的佼佼者。”而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有关会议中亦以此书作为会议赠书,从而也扩大了拙作的影响。据笔者所知即有两起:一起是在1990年2月,章培恒同志来宁参加“中华大典”会议,曾来玄武饭店看我(时正在参加省政协会议,住在该店),卞孝萱等先生随同前来,谈完正事后,卞先生取出“新批”,说是会议发的,让我签题;培恒兄则说他拿到的一本有倒页,正好手边有一部,随即送培恒兄。一起是该年的初夏,全国出版家会议在南京307招待所(今钟山宾馆)召开,百花老总徐柏容先生突然来舍间探访,取出“新批”一本,说是会议赠书,除让我题签外,还询问在下做此书的过程,连连称赞。后来他在《书评学》^①中颇有赞扬之语。此后,报刊颇多书评,如《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题为《传统形式的新收获》文中说:“陈美林是研究《儒林外史》卓有成就的学者。这部《新批》十万言的评点,处处表现批评者的审美目光以及对这部小说的系统认识。”总之,不断有批评“新批”的文章见诸报刊,直到2001年出版的《清代文学研究》书中还说:“陈美林在研究古人评本的同时,还借鉴这一传统形式,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新批’。该书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一连再版六次,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说是利用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新尝试和新收获。”^②

这些评论都未涉及“注释”,何以故?乃是原先的注释和长篇序言,在发稿前夕,注释全部撤下、序言压缩,总编认为份量太重,怕影响销路。但出版四个月后第一次印刷5000册已销完,1990年4月即第二次印刷7000册,至1998年2月第七次印刷,前后达六万册。其间,曾多次表达了补上注释的意愿,均未获解决,乃下决心通知他们停止再印。

其时,新世界出版社总编周奎杰同志来宁约稿。他先前曾任外文出版社文教编辑室主任,将笔者改写的一些古代名剧译成英、法、德文本以及汉英对照本去海外发行。而如今主持新世界出版社,不但可以出版外文书籍,也可出版中文书籍。她在京时已得知“新批”其书,颇有出版意愿,乃决定改写前言,增加原先被撤下的二千条左右注释,对夹批、回评亦作必要修改。他们于2002年1月出版了《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这可谓第二次批本。改名是出版社的意见,改何名则由笔者定夺。考虑到历史上几个批本或曰“卧闲草堂”或曰“天目山樵”。笔者住在南京清凉山侧多年,乃题作“清凉布褐”,即清凉山下一布衣。清凉山虽处市区,但颇有山林之趣,为笔者与友人散步、与弟子谈学时所常至者,并曾将论文自选集题作《清凉文集》;而明清之际的著名书画家龚贤也常住山中之扫叶楼,其词作《西江月》中有“山中布褐”之语,乃借用过来;同时《儒林外史》中之于老者也曾在山中种菜为生,杜少卿夫妇更同游此山。凡此种种,乃决定将它定名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下称“清批”)。“清批”出版后,如同“新批”出版时的情况类似,颇多书评。2002年9月出版的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51号有简讯云:“《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出版,京城十大媒体发文评介。”如《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图书评论》《对外大传播》《世界》《中国网》《光明书评网》等等。《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发表的何满子《伟大也要有人懂》的长篇书评中,认为“清批”运用回评、夹批、注释三种形式组合是很适宜的,说:“每回后有就文起义的‘回评’,相当于一篇紧凑的论文;正文中有点击文句的夹批,作较细致的导读;同时每页更有语词名物的注释,都点明其出处并引用载籍的例证。三者相互补足,对读者理解小说进行全面辅导,较旧时的小说评点更为绵密周到。”何评还对“清批”的“前言”和“代跋”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评本是撰者研治《儒林外史》的成绩的综合体现,也是他治学道路和他对小说所关注方面的生动反映。”要强调的是对“清批”的评论有一点与对“新批”的评论不同,那就是“清批”中增加了“新批”中被撤下的所有注释,所以评论“新批”的文章自然就没有对注释的评论。而对“清批”的许多评论,其中则大多涉及注释,如何满子先生就有评论拙作“注释”的文字,并且与某些小说的注本进行了比较,说这一“评本的功力,

^①徐柏容:《书评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9-70页。

^②季羨林、张燕瑾、吕薇芬:《清代文学研究》,第652页。

笔者以为充分显示于词语注释”，“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新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还有专就“清批”注释的评论文字，如《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第10期发表《用详尽的今注诠释明清文化——评〈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在比较建国后出版的几种《儒林外史》注释后，该文认为“陈美林先生不满足于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为小说作注，还力图通过注释小说来诠释明清文化”，以使“《儒林外史》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名著涵容的文化信息更为丰盛、更为密集。”为了说明“清批”注释的“详尽”，该文分别统计了几个整理本注释条目的数量，说“张（慧剑）注本为942条，南师本为1098条，精校精注《儒林外史》为824条”，“清批本的注释共有1987条，比其他注本增加一倍左右。”其实，在某些本子中有些该注而未加注，这就不仅仅是整理工作的粗疏所致，如第六回“律设大法，理顺人情”、第七回“羡尔功名夏后”等等都应该注而未注的；还有些诗句如第二十五回的“天下何人不识君”，第五十三回的“无人知道外边寒”，前者为高适《别董大》、后者为吴融《华清宫》诗句，一般整理本均未出注，而笔者则努力为之。何满子先生在书评文中乃有如下评价：“小说中的成语、方言、俗谚、瘦词，旧时的制度、名物、掌故等，都作了精当的诠释，引经据典出语源、示例证。这些都很费心力，前人称之为‘水磨工夫’。”《中国图书评论》的书评还统计了“清批”有关科举方面的注释“多达176条，将这些条目与小说原著合而观之，俨然是一部中国科举文化的百科全书。”的确，笔者十分注意科举制度的各个环节在《儒林外史》中的呈现，但同时也时时提醒自己《儒林外史》是小说，是“文”而不是“史”，要注意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这无论在校、注、批中都有体现，不妨各举一例说明：如四十一回写李老四称王义安为“老爷”，有的本子认为只有举人身份才能称“老爷”，一个开妓院的人只能称“老爹”，所以将“爷”改成“爹”。其实就是这个王义安，早在二十二回里就戴着秀才的方巾公然出现在大观楼酒店中，人们也熟视无睹，如果不是两个存心敲他竹杠的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在“店里人做好做歹”叫他掏出三两七钱银子“做好看钱”才罢手。可见服饰的紊乱、称呼的混乱，正是现实社会礼崩乐坏的真实描写，如果非要以科举制度的规定去改动文学作品，岂不是混淆了二者的区别与不同的功能！除校以外，在注文中也注意及此，如第二回有“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中状元的故事”，在注文中据《宋史》本传说，梁灏于42岁时已卒，“八十岁中状元”乃笔记所记，前人已有辨正。而一些戏曲作品是以笔记所记为之。批语亦然，如第一回所写王冕，即在夹批中指出宋濂、朱彝尊曾先后为王写传，不可以之推求《儒林外史》中作为文学形象的王冕。文史不分的研究方法，直到新世纪仍有文章如此，笔者为此专门发表了《古籍校刊与文学作品解读》^①，以表述一己之见。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笔者曾拾起“五四”以来即少有人为之的批点方法研究《儒林外史》，前后批了四次，均得以出版。这也是出版家的垂青，自然离不开读者的欢迎。一些研究专家也颇重视。如1991年在匡亚明主持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得与冯其庸先生相遇，冯先生曾问我说：“《新批》已印行三次，是否准备修订？”我告之正在进行中，同时反问冯先生是否有意有意批评《红楼梦》，他也说正有此意。对于这种形式的发展前景，2006年8月3日《社会科学报》发表了周兴陆同志的文章《应该加强文学评点研究》，文中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在努力沿用评点这种传统文学批评形式而灌注以现代精神，如陈美林评点过《儒林外史》，王蒙、冯其庸、张曼菱等都评点过《红楼梦》。相信通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评点这种切合国人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的批评方式，一定会在文化活动中获得新生。”

至于何满子先生文章中提及的《儒林外史人物论》一书，此文不拟详述。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是以塑造文学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特点，它很少有贯穿全书的人物，笔者曾经在《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发表《〈儒林外史〉人物进退场》文章，以及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1985年8月）发表《论〈儒林外史〉人物性格》等文。1989年冬中华书局胡友鸣、

^①陈美林：《古籍校刊与文学作品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余喆先生来舍间约稿,即商定为《文史知识》设一专栏,,但因手头另有约稿,请予稍缓时日。胡先生乃请笔者先写一篇“治学之道”栏目的文章,于是便有1990年第3期《学林寻步》一文。直到1991年第7期人物论才开始发表。第一篇为《“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①,连载了十余篇后又陆续加写几篇,于1998年8月出版了《〈儒林外史〉人物论》。当时亦有一些评论发表,仅录《清代文学研究》的评述,该书认为在研究《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论文中,“陈美林的研究成果尤为引人注目。他从1991年以来,陆续撰写了近20篇关于人物形象分析的文章,从而构成了《儒林外史》人物论的完整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力求从文化背景、作者际遇、时代特色、作品内涵等方面分析人物性格及其形成的内外因素和主客观条件,从而颇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思想性格和艺术特征。”^②亦有友人索取此书,说是正在撰写某部小说的人物论,拟取法拙作。此位友人也是名家,书送了,但建议自作主张,拙作不足为法。

关于作品研究的其他论著,就不一一提及了。

四

在研究某一作家作品之前,必然要考虑前贤对这部作品、这位作家有过哪些研究,留下哪些资料、著作,并以之一己研究的出发点。笔者研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自也不能例外。首先研究的是胡适和鲁迅两位的有关论述。特别是胡适,颇以与吴敬梓为安徽同乡而自豪,在其所写《吴敬梓传》中认为“我们安徽的第一大文豪……是全椒县的吴敬梓”;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说“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因而他对“第一个大文豪”“第一流小说”颇多论述,其研究成果多为后人引述。笔者也是先行研究他的有关考述着手这一课题研究的。全面研读他的有关论述,对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有所考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对《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也有一些分析评论,应该说对这位作家、这部作品的研究,胡适是有相当的成绩和贡献的。当然,由于文献的发掘尚未深入、研究方法亦时有偏颇和审美意识的时代局限,他的考证有得有失,其评论亦有可取和欠当之处。笔者曾先后发表了《吴敬梓身世三考》(1977年)和《略评胡适对〈儒林外史〉的研究》(1981年)二文。同时,对鲁迅的有关论述,也深入学习探讨,也在1981年发表了《鲁迅与吴敬梓》一文。这几篇文字收入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吴敬梓研究》一书中,可说是笔者最早发表的对研究论著的研究文字。

与研读前贤著作的同时,也在探寻前人的著作,20世纪70年初曾赴安徽寻书访人。在赴皖之前,笔者曾略作准备,在寻书方面重点在寻访胡适未曾见到过的康熙《全椒志》,以及金和出藏本与薛时雨集资为之笺注印行的《儒林外史》。笔者曾找到薛时雨后人薛健驰,但对先人事迹茫然无知。而康熙《全椒志》却在全椒档案馆中发现合肥古旧书店翻印的油印本,后又在合肥见到原刻本,笔者为之笔录不少内容,在不佞一些考证文字中也曾有所引用。并专门写了一篇《略述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发表在《文献》第15辑(1983年),这才稍稍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十年后的1993年10月,全椒有关部门方据合肥古旧书店油印本整理排印,并赠送在下一部。当时的县领导还对笔者表示感谢。在南京,更是遍寻有关志书载籍,多方搜寻有关资料,如朱绪曾的《金陵诗征》、陈作霖的《金陵通传》、陈古渔的《所知集》等等,每有发现,则摘录下来,在有关文章中引述。不仅如此,也偶有专文介绍,如《陈毅及其〈所知集〉中所涉及的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③。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对清人的几个评本也深入研讨,早在1984年就发表《试就卧评略论〈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④,其后又撰写全面研

①此文后被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26号转载。

②季羨林、张燕瑾、吕薇芬:《清代文学研究》,第648页。

③陈美林:《陈毅及其〈所知集〉中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江海学刊》1982年第6期。

④陈美林:《试就卧评略论〈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

究卧评的《〈儒林外史〉卧评略论》^①；对其它三个评本也先后发表了《新近发现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略议》^②《〈儒林外史〉张评略议》^③《略论〈儒林外史〉齐省堂评》^④。对此，《清代文学研究》有所评议，说笔者这几篇文章“不但分论四家评本的特色，还比较了四种评本的得失”。^⑤自然，研究这几家的批评，对于笔者作“新批”是必需的准备，但同样对研究史的撰作也是一种前期工作。

此外，还应约为韩国《中国小说论丛》第6辑撰写了《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长文，从吴敬梓亲友如程晋芳、吴槩、金兆燕等人的诗、文、笔记中所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究成果一一加以评述。后又在《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39号发表《二十世纪〈儒林外史〉研究概况》。同时，又对吴敬梓思想的研究状况发表了《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⑥《试论“思想家小说”作者吴敬梓的思想》^⑦《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纪略》^⑧等文章；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兄弟形象的刻画等都有专文评述。有关吴敬梓研究资料的搜集，也先后发表了《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与利用》^⑨以及《再议》^⑩二文。而对于一己的几部重要著作如《吴敬梓研究》《新批〈儒林外史〉》和《吴敬梓评传》也分别有专文进行反思。这些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后，被分别辑入《吴敬梓研究》（1984）、《清凉文集》（1999）、《吴敬梓研究》（2006，三卷本）和《独断与考索——〈儒林外史〉研究》（2013）等著作中。

凡此种种，均是为撰作《〈儒林外史〉研究史》（下称“儒研史”）所作的前期工作。如同《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新批〈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人物论》等著作一样，“儒研史”原先也拟独自完成，因自从被《儒林外史》“前言”小组剔出后，便在“儒林之路”上踽踽独行；也如同上述拙作一样，虽然获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第一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但均未申报过什么项目。恰逢此际，江苏省哲社“九五”项目已开始申报，学校科研处有关负责同志一再动员在下申报，以为学校多获取项目做贡献。在这道理说服下，便填了一张申报表，作为个人项目申请。不久，居然被批准。正当批文下达之际，吴波君考取不佞的博士生。他原先是亡友李厚基的弟子，1990年夏，厚基携其弟子二人来宁，由笔者主持他们的硕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授予硕士学位，各自赴工作岗位而去。未料1998年吴波君又考来南京，投入门下，入学之初，向我表示希望做些《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其时，正有东北一家出版社约我撰写有关《儒林外史》的读物，便转荐吴波及与其同时攻博的孙旭二人承担，他们合作撰写出版了《儒林探微》一书，在该书“后记”中说“我们自始至终得到了导师陈美林教授的悉心指导，……书中还采用了他的许多观点，本来，由他来领衔才是恰如其分的，但他以激励后学的高风亮节，坚不挂名，这种淡泊名利、奖掖后学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由于此书的出版，吴波君希望能进一步研究《儒林外史》，要求参加“儒研史”项目。出自薪火相传的考虑，乃允其所请。为了更好的培养他的研究能力，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搜集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全都交给他，并为之讨论如何撰写，先行拟定章节目录，反复研讨，然后由他动笔将笔者的论文逐一改编成一章一节。在与吴波君交谈中所表述的意见，后来整理成文，先后发表，如《撰写学术史的思考——〈儒林外史研究史〉漫说》^⑪《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再思考》^⑫《〈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

①陈美林：《〈儒林外史〉卧评略论》，《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②陈美林：《新近发现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略议》，《文献》1990年第3期。

③陈美林：《〈儒林外史〉张评略议》，《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④陈美林：《略论〈儒林外史〉齐省堂评》，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16号，1993年11月。

⑤季羨林、张燕瑾、吕薇芬：《清代文学研究》，第651页。

⑥陈美林：《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

⑦陈美林：《试论“思想家小说”作者吴敬梓的思想》，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50号，2002年6月。

⑧陈美林：《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纪略》，《长江学术》第3辑，2002年11月。

⑨陈美林：《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文史新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⑩陈美林：《再议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⑪陈美林：《撰写学术史的思考——〈儒林外史研究史〉漫说》，《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⑫陈美林：《撰写〈儒林外史研究史〉的再思考》，《河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外史》研究的研究》^①《〈儒林外史研究史〉：辨章学术，述往思来》^②等文。对于这一过程，吴波君在他的博士论文《〈阅微草堂笔记〉研究》后记中有所回忆，说：“我有幸考入南师大文学院，师从陈美林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入学之初，协助美林师写作《〈儒林外史〉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经过我们两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卅余万字的初稿，最后又由我再审读一过并予修改，决定先行上报结项。鉴定小组于2000年9月1日作出评审意见：

陈美林、吴波同志合作的这部《〈儒林外史〉研究史》，对清代中叶《儒林外史》面世直至二十世纪末的研究状况作了个总结回顾，总结了不同历史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的特点，勾勒出了研究的演进轨迹，选题新，文献资料丰富，论证周密。它的面世，对于指导我国的文学研究、拓展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均有重要意义。评审小组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具有很高学术品位的著作，同意通过鉴定。

初稿通过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考虑到作为学术专著，又是前人未曾涉及过的课题，要力求出精品。特别是有些问题，笔者虽曾有过考虑，但未成文发表，吴波君便无可根据，书中也就付之阙如。此际，吴波君已取得学位，即将返湘工作，便与之商量，决定找忠明君来承担“磨合”任务。忠明接受任务时原定一年内完成，但由于工作繁重，直至四年后的2005年5月方将稿件交我再次审读。在忠明“磨合”的五年内，我又陆续撰写发表了涉及这一课题的论文二十余篇，供其采编入书。忠明也自行撰写了少量文章，如近十年研究综述；还根据本人要求编制了两种索引。完稿后，便由忠明与海峡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朱欣欣同志联系。朱君原先在安徽出版社工作，后被海峡社引进为负责人。忠明与之往还颇多，笔者便交由忠明负责，而未再过问具体事务。海峡社乐于接受，并以此书申报“十一五”（2006-2010）国家重点图书。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在“新出图（2006）358号”文件中“中国文学”类28号：《〈儒林外史〉研究史》，著作责任者陈美林。此事，李、吴二君早已知悉，不佞于很久以后方见到此批件，便向该社提出，不能仅列笔者一人而忽略李、吴二君。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为此事专门做了研究，由于该书大都是您的研究成果汇集而成，同时考虑到知名度。他们也提到李、吴二君共同署名的“后记”中，也说明该书“是在美林师的研究基础上，大量使用美林师的研究成果，并在美林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事已如此，也不便再行追问。正式出版合同亦作：“甲方（著作权人）主编：陈美林（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著作责任人）；作者：陈美林、李忠明、吴波”。令人诧异的是见书后，封面及版权页笔者仅被列为主编，而作者中已无本人姓名，乃函询该社，接电话者闪烁其辞，后由该社编务室来函，说“因我社工作疏忽”所致，表示歉意，并将重新制作的版权页寄来。海峡社的致歉信于2008年9月8日在“中国古代小说网”刊出；同年10月25日，“中国文学网”也刊出并加按语：“本网按：据悉该课题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项目。陈美林教授为项目负责人。海峡社以此书申报国家‘十一·五’工程，并获批准。陈美林教授为唯一负责人。”清华同方于2011年出版该书电子版，即根据海峡社的正式合同，重新制作封面，作：“陈美林主编，陈美林、李忠明、吴波著”。2017年怀化会议论文集中，吴波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文中提及拙作多种，而于《〈儒林外史〉研究史》一书，再次标明“陈美林、李忠明、吴波著。”至于少数作者不明底里，沿袭海峡社之误，可以理解。但亦有少数论著将错就错，甚至连海峡封面所列“主编陈美林”也删去，仅存“李忠明、吴波著”。其手法令人可笑，岂能改变客观事实！徒劳而已。

当笔者将此书寄给何满子先生，很快收到他的复信：

美林兄：

蒙惠赐新撰《〈儒林外史〉研究史》，敬谨拜领，感谢无既。

兄真是为吴敬梓拼搏大半生，成绩卓犖可观，中国研究《儒林》第一家也。……

^①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②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史〉：辨章学术，述往思来》，《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

专此申谢赐书，并祝

大安

弟何满子 十一月八日^①

“第一家”之誉不敢当，但“拼搏大半生”却是纪实。从《吴敬梓研究》到《吴敬梓评传》、再到《陈批〈儒林外史〉》，后又归结于《〈儒林外史〉研究史》，可说是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做了一个全面的研讨，虽然难以说深入到何种地步，但毕竟尽力为之了。

五

《儒林外史》这一课题其实也是在改革开放前就着手的，但很快被迫中断一年后，方由职务研究改为个人项目独自进行，而获得的一些成果之所以能公诸于世，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了回顾政治运动如何干扰学术研究的这段历史，在世纪之初，曾发表了《人文版〈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②（下称“四稿”），既未点任何人的名，又未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反映史实、总结教训而已。发表近二十年，未曾见有人指责这篇短文。可是“追记”一文开篇即指出此文“与事实颇有出入的地方，作为当事人”，“有必要写文章予以补正”，但继而笔锋一转，在近二万字的长文中主要是表述自己如何“抓总”之事，未有一字指出拙作有何“失实”之处。该文作者意图是将整理《儒林外史》一事视作“盛事”，当作系史上“光辉的一页”而“追记”的，可见其重视程度。既然如此，乃再三反思一己之作，又反复研读“追记”，笔者也一度为“当事人”，发觉拙作并无“失实”之处，倒是“追记”一文颇有可疵议之处，不妨略作追记。

1971年9月中旬，在一次全系教师会上，领导宣布一件事，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我系重新整理《儒林外史》撰写前言，决定由羊达之、陈美林、李灵年、钟灵四人组成“前言”小组，李灵年任组长。但尚未及正式进行，又随全校师生于10月下旬赴句容农场参加秋收秋种，归来时已是11月底。休整数日后，小组便开展活动，无非是寻找有关图书、资料，先行阅读起来。转眼已是1972年，在将从校图书馆、系资料室寻出的关于这一课题的有限资料读过一遍后，颇感不足，乃有外出寻书访人之举。除羊老留守外，李、钟二位先去芜湖，笔者则于次日直接去滁州与二位会合，同在滁州、全椒、合肥三地活动。我们曾找到吴敬梓后人吴焯棠，但未能谈出有价值的材料，也找到薛时雨后人薛健驰，更是茫茫然。只在档案馆中寻到康熙《全椒志》。不过，此行倒对滁州、全椒有所触动，他们开始对吴敬梓这一历史名人重视起来，不断有地区和县的同志持介绍信指名来访，如地区的吴腾凰、余凤斌，县的武漪波、曹治泉等。为搜集有关吴敬梓资料，武漪波同志还有感谢信，说曾去了北京、扬州等地，广泛寻求，但“都没有超越您给我们介绍的范畴”。该县的领导前后来过舍间的有阚家衡、殷守余、龚金龙、李宗烈等。为表示对我的感谢，李宗烈同志还于1997年11月21日将他们专门在景德镇烧制的吴敬梓像送来舍间，当然这都属既往之事，不必再提。

安徽归来后，又经过一段时日的研读、整理，便着手撰写。经过研究，按时代、作者、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四部分各领一节撰写，笔者分领的是艺术特色。经过一个多月的撰写，全都交给组长李灵年同志，由他统稿——此处要说明的是，他却在“追记”中说“交由陈美林先生统稿”，此言不确。当年，他是教研组长之一，又是“前言”组长，党员，北大研究生，专攻小说，谁人能与之争？他也当仁不让。如今却将“统稿”一节移至在下头上，实不敢当。当年他的“统稿”被打印后，由系里组织古代文学教研组、文艺理论教研组部分教师座谈，大都认为四个部分分开看尚可，但合在一起不类一篇一气呵成的完整文章，“拼盘”痕迹太显，基本否定。这份打印稿，笔者尚有一份，题目下方有括号注明“供讨论

^①满子先生来信原件，在《追悼何满子先生》文中影印刊出，《钟山风雨》2015年第6期；后又辑入拙作《学林忆往》一书。

^②陈美林：《人文版〈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文史知识》2001年第11期。

用”。“追记”文中说,陈新回忆“他似乎听说这个初稿被否定了,但他没有看到这个稿子。”的确,陈新同志不可能看到,因为讨论后即被搁置,根本未拿出系。因此,拙作“四稿”文中也摒弃此稿,未将它列入“四稿”之中。而作为第一稿者,则为笔者所执笔。座谈会后约十来天,李灵年同志找我说,经系里研究,“前言”由你一人执笔,一个月完成。如期交稿后十余天,给了我一份打印稿,题目下方括号内注明“征求意见稿”,未再有“供讨论用”字样。此后又有几个月未有任何信息,仅告诉我已寄去人文社,等待他们复信再说。

大约在1973年春夏之交,忽然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人文社的杜维沫和陈新两位同志。他们首先说明,“收到《前言》后编辑室及时阅读,大体认可。为慎重起见,根据打印稿排印了几十份,分寄有关高校和研究所征求意见,各单位反馈有早有晚,前不久才收齐,经过综合,也大都持肯定意见,便再次来宁,你们可稍作进一步润饰即可定稿。”说着取出几份排印稿交给系负责人之一曹济平同志。会后,曹济平同志给了我一份。因陈新同志说排印稿完全按照打印稿排的,未有改动,我便将二者对读一番,确如陈新同志所言。如今这次的打印稿、排印稿,手边尚有保存,在“四稿”短文中,便将它列为第一稿。

两位编辑走后,一段时间未见有任何布置,不久便传出“批孔”的消息。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北京日报》接着又发表了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其间,新闻联播又播发了上海某大学工农兵学员文章《〈儒林外史〉是反儒尊法的作品》,虽未播发全文,只报了题目,但也足以使一些人闻风而动。第一稿“前言”中并无这类言论,自然被搁置,重新组织工农兵学员另行撰写,安排金启华先生与笔者为“顾问”(“追记”中亦有此语)。但实际上另有人在“问”,笔者便不“问”不“顾”了。但因有此名义,工农兵学员所写《前言》的打印稿,也给了我一份,同样保存至今。“追记”中却说工农兵学员“始终未拿出新稿”,而“不了了之”。现稿尚在,显系“追记”作者失记。在拙作“四稿”文中称之为第二稿,题目下方括号中也注明“征求意见稿”。

无论是灵年同志的“统稿”还是笔者的第一稿,均未注明时间。而工农兵学员撰写的第二稿,则在文前有一说明,并署明时日,云:“此稿系南师中文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就批林批孔前部分教师所写的《前言》,在系党总支领导下,和教师共同讨论修改完成的。现在印发出来,广泛征求意见,希同志们给我们更大的支持和帮助,搞好这一工作。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这正纠正了“追记”文中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在1973年的夏天”来南师约稿的谬误。因为1973年夏天已开始批林批孔,而安徽寻书、访人,四人分写一人统稿,然后又一人完成,北京排印征求意见,等等活动,均在工农兵学员接手之前。显然,约稿之举必在1971年无疑。“追记”文中失实之处,笔者仅举以上数端。因为工农兵学员完稿之后,笔者已被完全调出“前言”小组,所有有关活动均不让本人过问、参与,笔者也自觉回避。甚至李汉秋同志与安徽、滁州、全椒三结合研究小组前来南师取经,在座谈会上,汉秋同志未见到在下,便于会后请我系顾复生同志带领来舍间。他们方起步,承汉秋同志不耻下问,详细询问,便尽我所知所想,一一回答。

汉秋同志来访后,笔者方知道整理小组已改组,具体人员并不知晓,也不过问;今读“追记”方知共有十人,由灵年同志“抓总”,下分三个小组:校点、注释、前言。灵年同志还任后两个小组的召集人。原先四人小组,除组长李灵年同志留任依旧负责外,羊、钟二位或有其它任务(钟)或因年老(羊),“追记”文中说,“唯独未让陈美林先生参加,为何如此安排,不得而知。”其实,如此安排,当时同事都知道,目前在职同志当年都年青,或尚未来校工作,自然不知道。往事已矣,既然说“不得而知”,也就不必再去追问了。从此,便由职务研究转为个人研究,而工农兵学员第二稿如何转入教师手中成为第三稿(刊于1977年1月版《儒林外史》卷首,所署年月为1976年6月),笔者不知,不可妄测;但此稿在粉碎“四人帮”后即遭到批判,乃由原执笔人重新改过为第四稿(刊于1984年版卷首,署明年月为1981年1月)。整理小组是有组织、有领导,人多势众,便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做起来,终于经过数

年、多人的努力，“在张慧剑先生校注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标点和注释的，并新撰了前言”（“追记”）。而笔者则踽踽独行，与整理小组从无来往。如同笔者在《清凉文集·跋》中所言，“苜蓿生涯，清清凉凉”，只是“埋首牖下，仰屋著书”而已。但是一己的研究成果，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方能陆续面世。据有关统计，自1976年以来到1984年，全国发表的研究吴敬梓论文有150篇左右，有“三分之一出自江苏作者之手”。^①而笔者一人就有31篇，并出版了《吴敬梓》和《吴敬梓研究》二书。如今想来，得感谢当年不让我继续留在“前言”小组的同志，是他们促成了一己的努力。至于“追记”文中所云：“如果没有《儒林外史》新校本的整理出版，并由此产生的以陈美林先生为代表的吴敬梓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南京师大就不会逢此盛会，中文系的历史上也不会有如此光辉的一页”云云，但“追记”文中前已说过前言小组“未让陈美林先生参加”，因之，笔者何能“代表”？所谓“盛会”，乃是指1984年11月我校承办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追记”文中误为诞辰230周年），笔者只是作为我校一名教师参加，并不是“前言”小组的成员，更不是“代表”。“前言”小组的“光辉”，笔者绝不敢分享，特此郑重说明。关于这次会议，笔者亦有文记其事，即《30年前汪海粟主持的一次学术盛会》^②。

往事已矣。《凤凰江苏》韦晓东同志问及在下在“旅途”中的甘苦以及如何能取得这些成绩时，笔者乃引用前贤说过的：第一做你应该做的事；第二做你想要做的事；第三做好每一件事。如此而已。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Review of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n *Rulin Waishi*

CHEN Mei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author's academic research on *Rulin waishi* 儒林外史 (*literally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He began his work from the study on the family information and thoughts of Wu Jingzi, which resulted in a biography of Wu Jingzi, the great literary master in the Qi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he started the project exploring the thought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Rulin waishi* by means of the method of punctuation and annotation, which had rarely been used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author's four rounds of punctuation and annotation on *Rulin waishi* have all been published. After that, he completed a book entitled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Rulin Waishi* which focuses on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ir studies on this great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 He introduces some academic problems and expresses his point of view when writ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his own study. The book also occasionally shows the author's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hich, in the author's eyes, can be evidenced by each other but cannot be used as a proof to replace each other. This has also been demonstrated with some examples given in the book.

Key words: *Rulin waishi*; family information of Wu Jingzi;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Rulin waishi*

About the author: CHEN Meilin is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①《南京日报》1984年11月2日。

②陈美林：《30年前汪海粟主持的一次学术盛会》，《世纪风采》2014年第7期；又收入《学林忆往》。